

S h o u j i y u X i n j i

手迹与心迹

张业松 著



学
灯
新
丛

X u e d e n g X i n c o n g



广东教育出版社

u e d e n g

X i n c o n g



学灯新丛



手迹与心迹

张业松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迹与心迹 / 张业松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4
(学灯新丛)
ISBN 7-5406-5346-9

I. 手… II. 张… III. 社会科学 - 随笔 - 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475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桂城叠南)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24 开本 11.25 印张 225 000 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406 - 5346 - 9/C · 21

定价: 24.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目录

Contents

为什么写作	2
鲁迅的宽度	5
再谈鲁迅的宽度	7
纪德《从苏联归来》的中国回响	10
关于王实味的被利用和被批判	17
一则日记材料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26
有关巴金的事情	32
非典型纪念	
——认识李慎之先生	37
“人”字的写法	41
历史的背面	48
贾植芳先生学术贡献简述	52

电影笔记三则	60
《西游》小记	67
我们怎样生活过	
——关于“三毛真相”	95
关怀现实的主义	99
邱华栋：遗忘或重建	102



学灯新丛

2 手
迹
与
心
迹

乡土·青春·90年代性

——谈许辉的长篇小说《尘世》 107

“90年代性”与作家的精神资源问题 113

《青春之歌》的文学价值 117

“主义”和“现实”

——对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理解 124

《三人行》之二人言 140

青年茅盾：从“新青年”到“阶级艺术家” 148

“一生两世”与强制遗忘

——关于“路翎叙述”的叙述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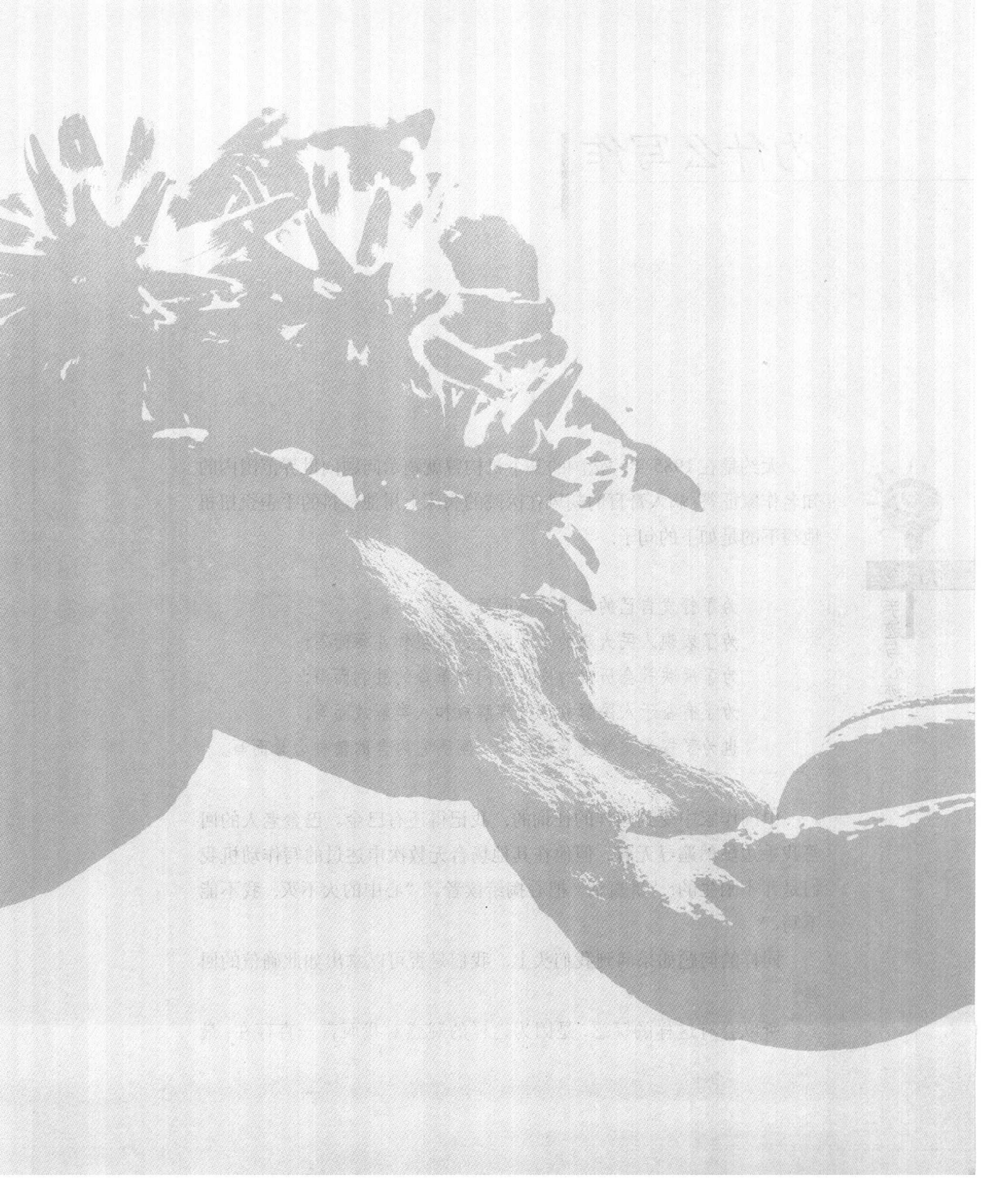
《路翎印象》编选小序 185

《路翎晚年作品集》编集说明 193

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203

胡风：批评的“现实主义的路” 245

后记 265



为什么写作



新丛

2

手
迹
与
心
迹

大约是在1985年，法国的某个机构曾就题示问题向世界范围内的知名作家征答，病人膏肓的胡风在医院的病床上用他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的是如下的句子：

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
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
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
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
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含的精神力量而写。

中国作家中受到同样的征询的，我记得还有巴金。巴金老人的回答我手边虽然遍寻无着，但他在其他场合无数次申述过的写作动机我们是并不陌生的：“讲真话，把心掏给读者。”“心中的火不灭，我不能不写。”

同样的问题如果问到我们头上，我们是否可以拿出如此确信的回答？

所以会有这样的疑惑，是因为这样的疑惑对我而言一直存在。最

近在聆听一位朋友细谈自己对鲁迅的理解时，某个机缘生动地触发了它。就在朋友的谈论中，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鲁迅其实已经离我们很远。事后的自我认知表明，这种距离感产生于对鲁迅的写作动机和自己的写作情境之间的差距的意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鲁迅先生当年提笔作文时的那样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了，于公于私，我们的写作都要被动和勉强得多。为什么写作？同样的问题在鲁迅那里，在鲁迅的门徒胡风及其年轻友人那里，和在这里，回答起来不仅大不相同，而且可能已经有了某种质的差别。鲁迅在“金心异”的促动下做起小说来，是要为“身外的青春”一掷“心中的迟暮”；胡风们在他们最惹人非议的时候，是为着充溢胸中的“急迫地要求着首先‘整肃’自己的队伍，使文艺成为能够有武器性能的武器”的“战友道德”激情；我们呢？不仅已经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先觉之声”需要发表，并且也早已失去了胡风们曾经那样强烈地渴求着的“那半个中国”的种种神秘魅惑。如果我们的确不曾依傍现实的权势说三道四，如果自鲁迅到胡风自主言说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确曾无声地从我们身上淌过，那么现在我们到底为什么写作？为了攒字数？为了评职称？为了地位？为了声望？为了钞票？为了表演？为了“话语权”？为了大学的研究生院召集的一批人“议定”的“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目录？为了不断扩张的媒体版面的“召唤”？为了……？总之，现在可能会有一千种理由促使我们打开电脑或拿起笔来，勤奋写作，这一千种理由中又可能会有九百九十九种都与我们自身的物质生存状态息息相关，剩下的唯一一种纯粹精神性的理由可能只是：虚荣。

作为“我们”中的一员，如果你现在置身于一个无须靠写作亦即“建构话语”来证明自己的生活环境中，你会写作吗？当你写作时，你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

为什么写作？这样的问题不得到认真的追问，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能够“建构”的“话语”，大约就永远只是一些你在任何时候都不必在意、更无须担心错过的东西。

施战军兄来沪，以《作家报》所组织的“知识分子话语建构”讨论殷勤相邀，盛情之下，却之不恭，爰作数语以报。如不合用，施兄弃之可也。



新丛

4

手
迹
与
心
迹

鲁迅的宽度

凡事一涉“主义”，就有些不好办。所以朋友笑倒为了搞清鲁迅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发愿系统阅读《鲁迅全集》，我是不以为乐观的。倒不是怀疑他的能力，而是，现如今的各种“主义”早已被收抬进了各自的专卖店，你要去染指，指不定就会有人出来“维权”。所以我建议他，不如趁这个系统阅读的机会，思考一下“鲁迅的宽度”。这个题目的难度当然不小，但在当前的语境下却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如另一位朋友苏三所说，现在是胡适的语录随处可见的年代，似乎谁都会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这样说着的人却未必真能体会到“容忍”背后的承担，掂量出这两个字的实际分量。“容忍”决不是无原则的无可无不可，不是无担当，相反它是建基于一种确信和肯定之上的勇毅，是要将自己的“所是”贯彻到底的固执。胡适是懂得这个的，所以他行事从不犹疑，哪怕为此担上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鲁迅也是懂得这个的，所以他骂这个骂那个，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不搞人身攻击。他的“不宽恕”，与其说是针对特定的个人，不如说是针对特定个人所代表的某种“不是”。在这方面，反而是日本的学者比我们对鲁迅了解得深入得多。我曾读过一个叫丸山昇的日本学者就“洋场恶少”的公案所作的研究，他所爬掘出来的鲁迅在这一问题上



新丛

手迹与心迹

的持论思路令我印象深刻；而我们的学者却常常是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鲁迅一时一地的片言只语，支离灭裂地来做他们所谓的“论”。

要说鲁迅一生中真的曾对某个个人“不宽恕”的话，那决不会是何其他人，而恰恰就是他自己。笑倒的感觉很敏锐，说得也好：“走进他的无物之阵，发现一元也不能存在，却又似多元碾轧，犹如走进一片焚烧着的旷野，吞噬一切的广袤，乃至自己的存在，甚至没有尼采似的重估。”的确是这样，他的不妥协的怀疑精神，最深的根源是在对他自己的不信任。“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当从那时起到现在，所有的人都以“救自己”和“只有自己值得拯救”为第一急务和唯一确信的时候，唯有这个鲁迅，想到的是那些还没有进入既存秩序的孩子。什么叫“援人出于荒寒的先觉之声和温煦之声”？“救救孩子！”这就是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人性、更温暖的声音吗？

所以才有一个“偏颇”的鲁迅，也才有一个“有宽度”的鲁迅。鲁迅的宽度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在于无“私”，即绝不自我中心主义。所谓“只有公仇，没有私怨”，而这个“公仇”的对象，首先就是他自己。苏三的“成为自己需要嘲弄和丢弃的对象”一说很到位，但是这个“成为”却并非始自“被肆意的放到一人之下的思想圣坛上”的那后来，而是在像《腊叶》那样的篇章中就已经非常明确了。鲁迅并不像他的一些不肖子孙那样自恋，相反他嘲笑（含泪的笑啊）“孤独者”，鄙薄“思想界的先驱”，他非常清楚那就是他自己。你看《伤逝》，无辜的涓生被写得多么丑陋。“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说到做到，知行合一，或者说严格约束自己做到知行合一，这样的自我持守，这样的“底线”道德，我们又何必管它叫不叫“自由主义”呢。

鲁迅是谁？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自由思想者啊。这个话我们总是可以说的。

2001年3月16日

再谈鲁迅的宽度

从2003年《书屋》第2期上读到闵良臣先生的文章，劈头引了一段我去年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小文《鲁迅的宽度》中的话，看得我一惊，心想糟糕，出纰漏了？战战兢兢读下去，才知道闵先生的文章是在和别人打架，所以要把我拉出来示众，大概竟是因为我的那几句话，他看着还不算碍眼吧。

不过这倒也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迫使我进一步想想，在鲁迅的“不宽恕”似乎已取代“民族魂”成为他的墓志铭的年代，“鲁迅的宽度”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命题。我没有系统研读过鲁迅，对他所知尚浅，下面要说的，自然也只是一孔之见，甚至可能连“见”都算不上，只是略有所知的一知，仍然止于“随便谈谈”。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从思想家的角度阅读和解剖鲁迅的，我认为这一路鲁迅研究，多少都有一点剑走偏锋，要拿鲁迅的“思想”来做另外文章的味道，不那么可取。在我的阅读中，非常对胃口，同时也觉得启发很大的，是普实克、李欧梵、夏济安、竹内好等人研究鲁迅的作品。普实克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和竹内好的《鲁迅》都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竹内所说的，认同“鲁



新丛

8

手迹与心迹

迅是个文学家，而且是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家”，也就是从根本上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来对待，这样，他的“思想”也就变成了文学家的思想，即基于文学、落实为文学，而不是高于文学，超越于文学或者指导着他的文学。他的思想中的矛盾纠葛，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天经地义，而且也正是其文学的内在张力和魅力的来源。如果离开了他的文学表达和文学思考，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的鲁迅其实就不能存在，或即使硬被人拼凑出来，也只是纸糊的高冠，或者泥塑的傀儡，只有在特定的现实需要促成的特定话语氛围中，才能烜赫一时，而无法像上举诸家那样，达到与鲁迅的心灵会通。按这样的思路去阅读和思考鲁迅，才会看出上举诸家之研究的巨大好处，在于他们都能着眼于而且揭示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美学秘密。普实克是在世界美学背景上来看，夏济安对于中国的“黑暗之心”及其魅力有着深切的了解，他们都贡献出了自己的独得之秘，为什么不循着他们所指示的秘密通道去接近鲁迅？

这里没有玄学，除非你把美学也看成一种玄学。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美学的世纪，更是科学全方位渗透到人类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加以系统化的去蔽和解神秘化的世纪。这个世纪为人类的美学想象提供的拓展空间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各种美学实验的兴盛，自然无须我来强调。美学成了这个世纪人类精神的主要存身之所。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我们找不到哪怕一种足以与黑格尔世纪相匹配的伟大构造，相反，我们所得到的，更多是那些具体领域的合理化摹画，和所谓“诗化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要尝试以结构明晰的理性图式为思维追求的话，那就只能说明我们自己仍然未能摆脱“黑格尔的鬼影”，仍为19世纪的思维教化所掌控。在已经有那么多前车之鉴的情形下，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徒劳无益的事呢？胡风引用但丁的《神曲》作为他最重要的系统化理论著述《论现实主义的路》的题词：“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

一个湖。”长久以来，我一直为这个题词而迷惑，现在我懂了，那就是他和他的时代的精神努力的最好写照，一个美学化的写照，同时也是美的写照。

鲁迅前半生落入“绝望”的深渊，是创作拯救了他；晚年落入“虚妄”的围困，是“杂文”在支撑着他。夏济安的分析多么深刻啊，从“号角”中读出的是“黑暗”的美。鲁迅为什么特别能战斗？因为那些从文学（性）书写中得到的无以替代的隐秘快感：“他确曾吹起喇叭，但他吹出的曲调却是阴郁而带讥刺，既包含着希望，也表达绝望，是天堂的仙乐和地狱的哀歌之混合。”是一种文字之美和文字所构造的意境之美，在深刻吸引着鲁迅“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的心灵，使他“……于浩歌狂热之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的丰富和深刻，是如假包换的文学（性）的丰富和深刻。他所谈论的一切具体主题，也许有朝一日都能如他所愿的“与时弊同时灭亡”和“速朽”，但他所留下的文字之美，则必然会对夏济安所说的“中国心灵”构成长久的吸引，这才是鲁迅真正的魅力所在。

只有以对这个“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家”的认知为基础，我们才能谈论鲁迅的宽度和关于鲁迅的一切：他的自私，他的承担，他的“思想”，他的后果，他的伟大光荣，他的谬种流传……以至最后，“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他的遗言吗？

2003年4月25日于汉城高丽大学

纪德《从苏联归来》 的中国回响



新从

手
迹
与
心
迹

10

随着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50年后的解封出版，安德烈·纪德的同类性质的著作《从苏联归来》也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听说湖南的大型文学杂志《芙蓉》正在连载此书的新译本，漓江出版社也将出版一种新译，一时之间蔚为热潮似的。牧惠先生在去年第5期《随笔》杂志上撰文介绍此书，使我记起了自己曾接触过的一些相关材料，因此也来说一说，就算凑个热闹吧。

牧惠先生介绍的，是他所见到的一种此书30年代的旧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林伊文的译本。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的著录，这个译本的译名即为《从苏联归来》，1937年4月初版，7月再版，32开本，全书共162页，其中“代序”28页。用作“代序”的，是维多·绥奇的《论纪德与〈从苏联归来〉》。正文之外，此书还附有纪德访苏期间所作的演说和其他文章八篇，分别是：《高尔基下葬时在莫斯科红场的演说》、《对莫斯科学生的演说》、《对列宁格拉文学家的演说》、《反宗教斗争》、《鄂斯特洛夫斯基》、《一个集体农场》、《波尔塞伏》和《流浪儿》。牧惠先生着重介绍的是正文部分的内容，代序部分略有涉及，附录部分则只字未提；忽略附录的原因大约是因正文中记载了纪德在苏联各地的演讲稿译成俄文常被修改的情节，以及他对此所作的抗议和声

明：“我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但是，《从苏联归来》最初并非以俄文出版的，林伊文据以翻译的版本应该不会是俄文，因此这个译本中所附的纪德演讲稿也应该是可足征信的。

纪德于1936年夏应邀前往苏联作为期两个月的参观访问，期间曾由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陪同在莫斯科红场为高尔基致悼词，8月下旬回到法国，11月即出版了《从苏联归来》。此书在出版当年即畅销十余万册，数月之间更累计印刷达三百五十版，诚所谓盛况空前，“沸腾了全世界”。这个“全世界”，不仅包括了对之表示热烈称颂、借机大唱反苏论调的西方主流社会，和因此奋起回击、深怪纪德丧失立场的亲苏阵营，同时也包括了抗战前夕在国际文化交往上活跃而开放的中国。我国文化界对此事的反应应该说是相当及时的。比如在1937年3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七期《光明》半月刊（洪深、沈起予主编）上，就有一篇署名杨哲文的综合性报道：《纪德的〈从苏联回来〉所引起的反响》。这是一篇态度上倾向左翼，但行文持论均相当平实的文章。它首先简略介绍了有关此书的情况和它引致争论的核心之点——即纪德所谓“苏联并存着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更适当地说，苏联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也有最光辉的东西忽然变成了最暗澹的东西的事”的论调，之后，着重对一位英国学者的总结性评论和罗曼·罗兰对纪德的严厉批评作了详细介绍。该英国学者将“纪德对苏联的非难”总结为三点：“第一，纪德以为苏联民众所能到手的使用品都是一律的，都‘差不多’，没有趣味”；“第二，纪德以为苏联主导者层，从其心理上看来，简直与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无异。因为他们带着正统派（Orthodox）性，胆怯自矜”；“第三，纪德以为苏联在思想上弥漫着类似化和一样化，缺少个性。这种类似化、一样化，纪德以为是上部的强制，推而进之，更以为是由于个人的独裁”。在对它们作出逐条反诘之后，这位英国学者最后



认为，纪德所以会有以上看法，是因为他“无意识地在苏联去要求资产性的乐园——即资产社会所达到的种种最高价值能与集团社会所达到的最高价值共同存在的那种社会”，而这是一种“想像力的缺乏”，“因为他不曾先明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非由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发达来的”。

罗曼·罗兰对纪德的批评见于他1937年1月5日致钢铁工人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我理解诸君对纪德的著书的动摇。这部书实是愚劣的，平凡的，非常贫弱的，表皮的，幼稚的，反对论者的书。假如这书引起了多大的反响，那也决不是有若干的价值所引起的。因为全无这种价值！反响是在：无时无处不在对苏联作诽谤，准备着武力之途的苏联的敌人，利用纪德的名声，在其周围唤起反响来的地方才有。现在我对纪德的书作一个严密的反驳吧。纪德在停留于苏联的时候，并不倦于公然地表示自己对苏联的忠诚和爱，可是一旦回到法国来便取了后足踢沙的态度。假如他是有诚意的人，应是玩不出这一套“诚意”的二重性来的。对他的这种态度，我是极端愤激的。

到现在纪德说：我并不想对苏联和革命招来坏影响，只是一切反苏联的报纸都利用了我的书，乃是极遗憾的。可是最初对纪德的警告并不是不充分的。我知道有亲友曾指摘其整理好的著作中的坏倾向，顽强地劝其在未出版之前稍为考虑一下。可是他不但不听，反而赶紧地用廉价版大量地发行了。

现在，纵使他要对反动的走狗“费尔其塞尔·伯阿巴尔特尔”以下的祝意和下贱的称赞加以反驳，这连他也会感觉是拙劣的。这虽然是彼等应作的告白，但已经迟了。因为罪恶已经完成了。纪德